

朝花夕拾《文史哲》

郭震旦

作为一家学术名刊,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的很多故事早已为人耳熟能详。笔者在编著《〈文史哲〉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》一书时,曾从头到尾翻阅了《文史哲》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 7000 多篇文章。今从中采撷若干不为人所熟知的片段,以飨读者。权且当做朝花夕拾。

《文史哲》与年轻学人

提起《文史哲》,人们几乎下意识地就想到它身上“扶持小人物”的标签。李希凡、蓝翎两人的故事早已为人津津乐道。其实,李泽厚的故事与之相比毫不逊色。1955 年,李泽厚刚刚 25 岁,就在这一年的《文史哲》第 2 期发表了《论康有为的“大同书”》,这篇文章是由李泽厚的老师任继愈先生推荐的,这也是李泽厚步入学坛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。在这篇文章中,年轻气盛的李泽厚力排众说,对康有为《大同书》给予很高评价。此文标新立异,又极其雄辩,初出茅庐的李泽厚一举成名。2005 年,整整 50 年后,早已名满天下的李泽厚仍然对该文所产生的影响难以忘情。他说:“那时一些外国朋友来信,以为我是教授了,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。1980 年我到日本去,别人以为我已经 80 岁了,因为估计在《文史哲》等处发表文章应是四五十岁。”同年,李泽厚在接受《新京报》记者采访时又说:“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,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,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,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,第一篇是在 1955 年 4 月份发表的,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,跟美学无关。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,都很吃惊,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我现在看我 50 年前的文章,还感觉很欣慰,因为不管是内容,还是论断,都是对的。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,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一本书,一篇文章,轰动一时不算什么,如果过了 20 年、50 年还有人看,还有人买,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。”翌年,李泽厚又在《文史哲》第 5 期发表《论康有为的“托古改制”思想》。

李泽厚的这篇处女作颇引起过一番争论。1957 年 1 月,刚由常熟一所中学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的

汤志钧在《文史哲》第 1 期发表《关于康有为的“大同书”》,与李文展开辩论。按照汤文的想法,康有为《大同书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,是康氏晚年“麻痹群众”“反对革命”,“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”,而不是像李文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民主、自由的进步思想。于是,李泽厚又在当年《文史哲》第 9 期发表《“大同书”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——简答汤志钧先生》,回驳汤文。张玉田也在该期《文史哲》发表《关于“大同书”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——兼与李泽厚、汤志钧二位先生讨论关于“大同书”的估价问题》,参与讨论。

李泽厚本人非常看重发表在《文史哲》上的这些文章。他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说道:“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《文史哲》和《新建设》,报纸则只有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。”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李氏均有论作在《文史哲》上发表。

哲学家汝信的学术历程也与《文史哲》连接在一起。1956 年 1 月,《文史哲》第 1 期发表汝信的第一篇哲学论文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》,这一年汝信也是 25 岁,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,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。此时的他只是一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业余爱好者,尚没有受过严格



1957 年,汝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习。

的学术训练。几十年后,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,他在《汝信文集》自序中对该文作了如下回忆:“抱着试一试的心情,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写了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》一文,寄给《文史哲》杂志,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。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采用,这就大大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。”受此鼓舞,汝信考上了哲学家贺麟的研究生,逐渐成为一名著名学者。

其实,早在把矛头对准俞平伯之前,1954 年 4 月,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就曾向另一位著名学者发起过挑战,他在《文史哲》第 4 期发表《略谈“水浒”评价问题——读张政烺先生的〈宋江考〉》,直言不讳

地批评了历史学家张政烺的《宋江考》。《宋江考》发表在《历史教学》1953 年 1 月号,在这篇文章中,张政烺从《宋史》相关传记、《东都事略》《宋会要稿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等史书和大量当时人的笔记中梳理出宋江既没有征过方腊,也没有投降官府,且梁山好汉也不是一百单八将,只有 36 人。文章对小说《水浒传》有关宋江的说法多有否定。张政烺后来对学生说,“该文曾得到主席好评”。李希凡的基本立场是为《水浒》辩护。他认为,张政烺利用考据的方法研究《水浒》,完全混淆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。人民和施耐庵没有按照事实创造《水浒》和梁山英雄,而是把他们夸大和理想化了,这不仅是他们的罪过,反而正是这部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。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,是不会把《水浒》作为历史事实的考据材料的。李希凡的文章,因与许多学术名家如郭沫若、翦伯赞等人的学术观点相左而引起关注。《文史哲》编辑部特意为该文加了“编者的话”,指出“这种讨论的精神是应当提倡的,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‘谁都承认,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,没有自由的批评,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,不可能进步的’”。

据周清澍在《张政烺先生教学和育人》(载《张政烺先生学行录》)一文中回忆:“在批判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的运动中,他此文也遭到李希凡的批

判,闹得抬不起头来。”周先生的回忆似有些误差,李希凡对《宋江考》的批判,并不是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进行的,而是在半年之前就开始了。李对《宋江考》的批评,似对张政烺造成不小的压力,对此,周清澍说:“建国初期,张先生参与发起出刊《历史教学》,这时他正值盛年,正是将其积学发表的好时机。但他在该刊发表过四篇论文,其中一篇即前述的《宋江考》,与俞平伯先生同遭李希凡批判;另一篇讲的是《汉代的铁官徒》文章,又被翦伯赞先生著文批评;两篇文章挨了两棍,1959 年又遭批判,故以后他更多的把研究重点转向甲骨金文和碑刻方面。”

对于《宋江考》的学术价值,张政烺的门人王曾瑜认为:讨论宋江真实事迹,迄今为止,主要有三篇文章。余嘉锡的《宋江三十六人考实》长文,不仅对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《癸辛杂识》续集上《宋江三十六赞》等书记载的 36 人,而且对梁山泊的地理变迁,都逐一据史书作了考订。张政烺的《宋江考》则依据折可存墓志铭等记载,专就历史上的宋江事迹作了新证。近四五十年来,学界讨论宋江的文章虽多,但并没有超越余、张提供的史料范围。后来马泰来《从李若水的〈捕盗偶成〉诗论历史上的宋江》一文,利用了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的李若水《忠愍集》中的一首诗,算是对余、张二先生的作品作了唯一的史料补充。

上世纪 50 年代,农民起义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。尤其是关于农民领袖的评价,最为引人关注。这关系到现实中对中国革命路向的把握。1954 年,《历史教学》第 4 期发表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翼骥的《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?》,文中把项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来考查,认为在灭秦时,项羽代表着农民阶级利益,因此是农民起义领袖,灭秦后分封十八王,违反了历史统一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,则代表了旧贵族的反动利益,并因此导致他的最后失败。1954 年 10



李希凡 1975 年在漓江